



[德] 弗朗克·西伦◎著
Frank Sieren

许文敏◎译

ANGST VOR CHINA

惶恐与偏见

西方世界对一个崛起大国的复杂情感

WIE DIE NEUE WELTMACHT UNSERE KRISE NUTZT

是害怕、疑虑、困惑，
还是赞叹、钦佩、羡慕，
西方人如何看待当今中国？

新华出版社

ANGST VOR CHINA

惶恐与偏见

西方世界对一个崛起大国的复杂情感

[德] 弗朗克·西伦◎著

许文敏◎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惶恐与偏见：西方世界对一个崛起大国的复杂情感 / (德) 西伦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66-0610-0

I. ①慌… II. ①西… III. ①中国—概况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34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4354号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Berlin.

Published in 2011 by Econ Verlag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惶恐与偏见：西方世界对一个崛起大国的复杂情感

作 者：[德] 弗朗克·西伦

译 者：许文敏

出 版 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编辑：江文军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图鸦文化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610-0

定 价：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前言

常言道：“旁观者清”，此话有理。可不，当我从遥远的中国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时，确实有那种“站得高、看得清”的感觉。就我们德国人对中国的反应而言，更多的是关于“正在崛起中的世界强国”这样的话题，似乎这就是我们必须经常加以正视的主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实际情况都是，这个话题或多或少地暴露了我们自身的特点：德国人喜欢夸大其词，而且在全球性危机的时期更是如此。因为德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依赖出口，所以客观地去评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对德国人相当重要。遗憾的是，我们却远远地偏离了这个点。譬如，在2011年年初的一份德国报纸中就有人公开断言：中国是“那么令人可怕的强大”。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也类似于在德国所听到的，消极、负面的甚多，这是一家美国研究机构从2011年7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所得出的结论^①。不同于德国的是，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给予中国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甚至连美国人的评价也是正面的——尽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阴影更多地落在他们那里。此外，在对中国人印象不好方面，全世界也就只有日本人和土耳其人。

我已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17年。在这17年间，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过程：先是嘲笑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并对此感到惋惜；后来是惊讶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并批评和指责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随之就是担心和害怕；再后来就是，对中国的反应越来越激烈，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在德国，受聘人员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

^① 德国是59%，随后是法国49%。而英国则相反，59%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持肯定态度，美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则在51%左右。就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国家来说，日本为61%。

怕这些企业保不准哪一天转移到中国去；有汽车的只要一看见加油站的油价上涨，就担心中国的原料饥荒，怕因此会继续推高油价；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则在进入职业生涯方面，感受到某种来自亚洲的竞争威胁；中小企业担心中国廉价商品的竞争；大型企业的高管们反感中国的国企，担心他们勇往直前地厮打硬碰；德国政治家们则一边不断地高筑财政赤字的债台，一边眼巴巴地盯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尽管他们气鼓鼓地意识到，21世纪的主导权有可能落在亚洲。

只要涉及中国，盗版产品、网络干预、资源浪费、新殖民主义以及环境污染，所有这些都是德国经常使用的代表性话题，而正面的话题则少得可怜。可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则相反，他们对德国持尊重和敬佩的态度。我曾与负责欧洲事务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女士一起喝茶。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参观了一个有关德国启蒙运动的大型展览。当她看到这些展品时，她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德国是凭借着什么得以飞跃式发展的，而所有这些在动荡、战争和殖民化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和寓意”。“德国以其自觉、聪明和勤劳摆脱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并且在民主和富裕方面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令傅女士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德国人就不能理解，“中国，这个起步比较晚的国家”正经历着一个类似于他们的发展进程。“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发展所追赶上来的这些，其他国家也许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她引人深思地说道。中国领导人仍在努力，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这种发展速度，以免发生国际冲突和国内动荡。

“经过30多年富有成效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迎来了富裕和稳定，”傅女士继续说，“对此，我感到很自豪，因为这实在不简单。”毋庸置疑，中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傅女士操着流利的英语接着说道，“我们也就刚刚完成了改革的一部分，今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许多德国人其实非常羡慕中国人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也许老一代德国人还记得，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人们常常说起的那个话题：“黄祸。”他们

觉得，现在这些似乎得到了证实。2011年夏季，德国《图片报》以“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在怎样地席卷欧洲”为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人们也许不太在意这些细微之处，譬如，美国经济实力至少是中国的三倍。其实，这些也就更多地显示了，这种“恐惧中国”的心态已经深入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了。这种恐惧可能会导致麻木、停滞，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短期休克性反应。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那就是：中国不是敌人，尽管这个国家在不断地壮大，而且最终将超越我们德国。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竞争者，尽管承认这种竞争有时难免是苦涩的，可这个国家首先也是一个合作者。我们必须努力去建立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被眼前的一切吓倒，换句话讲，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并凭借这些成就和价值继续生存。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抵制压力和诱惑，主动向中国人推广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尤其是，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和基准，其中也包括批判性的，并且使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实质性的问题和关节点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抓住这场世界性变化所带来的新机遇，才能充分利用它们所带来的可能性，从而获得成功。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打破流行的观点，挑战僵化的思维，把未来几代人对世界的认识尽可能早地摆在当代人的面前。

就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影响而言，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远比一个世纪前美国崛起所带来的要更大、更深刻。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西方高技术产品最富有吸引力的潜力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对高档消费品也异常的富于吸引力。所以，中国经济才能以无可匹敌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而且数倍地超越了美国当年蓬勃发展的速度。要实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所获得的经济成就，美国花了大约160年时间。中国崛起也在文化内涵上明确地有别于美国。19世纪90年代，当美国取代英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时，赢家与输家在文化、传统上的“剪刀差”是相当大的——尽管今天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闭口不谈这一点，反而净讲反话。中国

则相反，他们讲的是“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截然不同于西方人的观念。还必须看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中国人的这种价值观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球得到认可，而我们将不得不对此采取妥协的态度，甚至大规模、多方面地妥协。在未来，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世界共同体的利益和要求，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一点首先涉及的就是全球性资源的状态。不同于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崛起时的是，现在的世界资源和地下宝藏变得极为有限和日渐短缺。目前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就这样继续消耗，资源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也正是由于资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德国也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以便使中国人也能拥有类似于我们的生活水平。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归根结底是所有后起的国家。

在西方，我们不断地增加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一个接着一个，这使我们每况愈下；而我们决策中接连不断的失误，也令我们能够活动的区间和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不可否认，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德国还保持着“模范生”和“标兵”的头衔。失业率在下降，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高，生活水平也相对比较好。德国属于世界上最有保障的福利社会。在过去的危机中，德国的临时工都有保障，企业方面也都不错。然而，我们却以“让我们子孙埋单”的方式在生活：德国金融债务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税收的增加速度，德国的许多区县都处在无偿还能力的压力之下。即便是在2010年，尽管获得了令人惊奇的3.6%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它无疑当属德国经济繁荣的一年），可就在这一年，德国竟然开出了一份新增赤字900亿欧元的财政报表。那么可以想见，在“正常的年景”里，这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将会有多高。况且还有欧元区危机将进一步“追加”的沉重负荷。

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申请国家补助，否则就会入不敷出。在2010年，当所谓的当年新增失业人数上升到140万人时，统计局宣布：全德国的失业总人数下降到300万。这个数字比2009年增加了4%，比2007年增加了13%。可是，我们还有130万人靠国家补助在接受就业再培训！这一部分人不被算作失业者，所以他们也就不出现在统计局的失业人数统计中。超过800万的人也许希

望继续工作，遗憾的是，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那些大型的临时工中介公司更多地忙于应对类似于巴斯夫（BASF）这样的大型企业，它们大约用了5万人。转移到国外去的工作远比新创造的要多得多。这一切就难免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德国人的购买力在持续下降，虽然生活仍然保持着一种高水平；中国人的购买力在增加，但仍然保持着一个低水平。作为一种普遍性趋势，这种迎头发展形成了新兴国家一方与发达工业国家一方的趋近。

这些情况有可能也与这种恐惧有关。尤其相对于德国的糟糕程度来说，所有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一个如英国这样的国家，甚至在2011年8月，强烈的骚乱竟然困扰了许多城市。这些示威者把怨气撒向国家，认为国家对经济萎缩以及贫富差距极端化无能为力。可以想见，我们在西方必须逐渐地习惯于这幅画面。

虽然中国的崛起以及我们自己在西方的问题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但我们既不能落入悲观主义者的黑洞，同样也不能被“西方优越论”者的主张迷惑。如果某个富得流油的人向您讲述，“西方资本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那您就得保持悲观的低调。中国崛起的事实显示，我们在西方过去几十年所推行的市场经济，有可能现在行不通了。即便是有这种世界性竞争，可这样的警钟却依然在对我们长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生产那些生命周期短暂的产品，并很快就把它们作为废物扔掉，以便再大量地、升级地去重新生产这些产品。这是一个螺旋，一个圈子转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快的螺旋，其旋转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直至可能会连我们一起被甩出轨道。小心点儿，千万别就这个结果对后人说什么话。

如果有人对您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早晚都得解体，您也许同样要保持低调。尽管对中国来说，不仅存在某些危机的象征，而且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别和分歧也已经触及红线，所以并不能排除会出现一种这样的发展可能，但这种发展的现实性确实是微乎其微的。这个国家已经显示，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仅仅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对众多的现实考核交出了合格的答卷：2008年5月四川的地震，吞噬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事件；百年不遇的洪水和旱灾同时降临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在中国，

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富裕对水就有极大的依赖性。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中国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本书第六章将告诉读者，为什么在加速这个问题的恶化方面，我们德国人也同样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尽管遇到了西方以激烈的批评作为伴随的影响，可依然顺利地完成了这场世界最大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工作。这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却似乎就那么简单地从中国滑了过去，并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遗症，可是在西方，时至今日仍未出现复苏的迹象。

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有益于中国，因为所有的问题和争论从界限上都明朗化。可这种做法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因为把领导国家这个极为复杂的重任仅仅归之于三个理由。

其一，就像西方的政客不断地努力尝试着，要借助于公众媒体来展示和实现自己的权力一样，这种方式的好处就在于，他们经常借助于新闻媒体对错误、丑闻以及搞砸了的政府项目进行批评。可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成了群众性的现象。中国同仁称这种个人发到网上的三言两语为“微博”，而且它在中国的网民高达几个亿。对于微博这类短小的文章，新闻监督就很难控制，可它们却有力量牵动整个社会的舆论。2011年夏，当那场导致40余人丧生的高铁事故发生时，微博就显示了其潜在的巨大能量。这样的网民运动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特点，而公众媒体所增大的压力就会限制政府的决策空间。

其二，国家治理的难度和领导的难度也必将增大，因为贫穷的西部、北部以及中部省份和富裕的东部、南部省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当发达地区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取代无节制的增长时，贫穷的省份则不惜一切代价要搭上高速发展的这班车，并且也要在富裕程度上赶上那些沿海地区。

第三个理由就在于，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它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性也势必增强。中国企业把自己的产品发运到世界各国，并且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直到南非，到处采购资源。包括政治合作关系在内，国际性合作也越来越紧

密。全球性问题，譬如在气候政策或者在世界金融政策问题上，中国政府都提出了意见，而且没有它的参与，许多问题就无法回答。

尽管面临这么大的压力，而且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得不忍受和挺着的压力，然而在所有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中国之稳定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对我们德国人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中国已经逐渐地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不断增长的市场，并将很快取代法国而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于德国国内富裕生活的发展而言，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最大的邻国（法国）。其实，德国今天的生活之所以能这么好，也有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份贡献。在2010年，德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为760亿欧元，与2009年相比，大约增加了33%；而德国的出口却增加了40%。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有一点就异常重要：不要糊里糊涂地、简单地给中国以“恐惧”的定义和印象，而是帮助它和平地度过世界秩序的激烈裂变时期。

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地、区别性地关注和分析那些竞争的心态，并且反复斟酌和考虑，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相对于10年前，我们今天以欠考虑的评注所造成的错误及其给我们所带来的危害，其程度和概率将更高，而后果也将更严重。这不仅是对政治家而言，也是对新闻记者而言，因为他们对内政这件“衬衫”的感知无疑比对外交政治这件“夹克”更贴近、更敏感些。一种也许早为人们所熟知的政治权力名言在此遇到了政治的理性：西方的经济状况越糟糕，政治家对一名替罪羊的需求也就越迫切。最好这个替罪羊离得很远，以免人们说不准哪一天就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咖啡馆”（Cafe Einstein）^①碰见了。

就金融以及经济状况而言，中国在2011年夏季时的局面前所未有的好。对这个在这一年庆祝其建党90周年的执政党来说，这确实值得自豪和骄傲。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认真反思的最佳时间点，也就是考虑这个中国的执政

① 爱因斯坦咖啡馆：一家位于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老牌咖啡馆，从位置上与联邦议会大楼、议员办公楼近在咫尺，议员们通常到此早餐、喝咖啡、碰头。因此，这家咖啡馆成了联邦政治的一个非正式活动中心。

党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最基本的要求，而这绝不仅仅是西方人向中国政府所提出来的问题，更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所提出来的问题。

然而，不仅没有哪个工业国家，而且也没有哪个新兴国家既如此繁荣、同时又如此稳定。这将是本书第七章的主题。人们的富裕程度在增加，而那些在中国由于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似乎也有别于西方。房地产市场尽管被炒得过热，但其泡沫却不大，而且确实小于人们所担心和想见的程度。所以，中国房地产泡沫吹破的可能性极小。中国银行的承压力也远超西方，因为西方不仅仅是许多银行面临破产，甚至连一些国家都已经走到了失去支付能力的临界点上。中国的政治家是深思熟虑后才行动的，而且带有前瞻性。通货膨胀的指数，也就是那场由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是可以控制的。中国的通货膨胀指数明显地低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过去的那场危机使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加进步了一些。这一章也要说明，中国以其美元外汇储备已经有能力在今天对美国形成什么样的压力；为什么德国和欧洲应该注意，以免陷入一个类似的依赖性中去。当然，也有输家，譬如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克里斯·坎德尔(Kris Kender)一家——我将在第二章介绍他们的情况。当德国的中型企业和汽车生产商在中国不断刷新盈利记录时，美国本土的整个工业领域几乎颗粒难收。先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而随后就开始了劳动力向中国的迁移。他们正是由于在美国看不到未来，所以才不得不去外国寻找机会。德国因此也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面对来自亚洲的这种挑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重蹈美国人的覆辙。

如果有人对您讲，中国人追赶不上我们的技术进步水平，那您就得反驳。为什么说要反驳这种观点呢？您不妨看一看本书的第一章。德国核能技术下马的最大获益者就是中国。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从德国接过了先进的核能技术，而且富有成效地把它继续向前发展和推进。还有在第四章所介绍的“隐秘的飞行物”，它告诉我们，中国人在技术进步方面是在以怎样的速度进行追赶和超越。他们不仅已经在自己建造宽体飞机，而且我们也在这

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这虽然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完全丧失在技术上的进步和超前性，但今后我们确实也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到底要开发什么样的新产品。我们也必须给后代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使我们一直保持技术上的进步。对德国人来说，那个仅仅沉浸在奖牌的喜悦中、靠吃老本过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有人说“西方公平，中国不公平”。这是一种谬论，这样的说法既不能听，也不可信。有关这一点，读者会在本书第三章看到。在一些国家，譬如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伊拉克等，中国与西方在争夺石油方面竞争得非常激烈。双方都不在乎，两种道德标准和玩世不恭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连西方的公众媒体，也经常难免玩这种游戏。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反应，就属于此类现象的典型例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明显趋势就是：以其13.4亿的人口，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将不断地增大。西方，尤其是德国和欧洲将不断失去其分量。我们必须看到并适应这一趋势。西方人现在陷入巨大的债务压力之下所造成的这些错误，也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强化了这种趋势的必然性。经济实力就在这里，它要求这个天平朝着新兴经济实体一方倾斜，尤其是朝着中国这个方向。所有这些尽管是如此有戏剧性，尽管它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愿意承认和相信的，但有一点必须看到：七大工业国在世界经济能量中所占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间从大约65%下降到50%。

对中国担心和恐惧的程度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而今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之强，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那些成长于“冷战”时代的德国人眼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之大，远远超过了所有习惯性思维模式所能想象的。

恐惧中国最明显的当属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看法：大约80%的德国人对中国在德国投资都持不赞成的态度。“大甩卖开始了！”一个德国网民在“每日新闻”的网页上对这种发展评述说，“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市场经济那错误的预言之后，出现的现实就是，类似于金融市场的废墟一样，货币不断地贬值，国家滑向破产的边缘，现在甚至开始了这场大甩卖。要不了多久，欧

洲就得按着中国人的指挥棒蹦跶了。”

这段评述不仅夸张，而且是错误的判断，因为中国企业的继续发展对德国也是一种机遇。中国企业与欧洲企业越是相互交织，彼此的了解也就越多、认识的程度也就越深。中国人越是不得不与德国人共同工作，他们寻求妥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越强。根本性或者说原则性的冲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2011年夏，中国的联想集团公司收购了德国连锁店阿尔迪（Aldi）的微电子供货商梅迪欧公司（Medion）以及德国计算机生产商，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以其6.29亿欧元的数目，联想成了迄今为止中国在德国最大的投资者，而且遥遥领先。回头看来，这次收购也许可以被看作在德国大规模收购的一个序曲和前奏。几年前，联想在美国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尽管收购梅迪欧公司之后马上会失去一些德国就业岗位，但是随后也将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为这家企业将在德国继续发展。对联想来说，离开了德国的这些生产和业务，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也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对于梅迪欧公司来说，没有外来的支持而独自坚持下去，从长远看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如果两国的企业能够相互合作，对中国和德国无疑都是好事。

如果涉及欧洲债务，那情况对中国投资恐怕就比较复杂。不久前，在我与中国央行的一位高管一起用餐时，他原想就欧元危机的最新动态给我一些信息，可我们随后说着说着就谈到了中国在此的角色和作用上。“你们也别太害怕，”他以平静、友好的口吻对我说，“我们中国人需要欧元作为对美元的抗衡，所以欧元不会真正地陷入绝境。”确实如此：在2011年8月新的危机席卷欧洲时，中国的政治家几乎只批评美国；尽管欧盟，也包括个别极端本位主义的国家提出种种批评意见，可中国还是公开表示，要对欧洲予以支持。欧洲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中国人确实非常在意欧元的稳定，否则绝不会对这个欧洲联盟货币问题做出这样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人给欧元以大量的投资，那么欧洲政治的依赖性势必就会大量地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人就低估了这一点。他们当时只看到，如果中国人给我们贷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另外还有的不外乎是，中国人对美国的未来

充满希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换言之，这个东方国家已经成了“美国的银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已经就崛起的与衰落的世界强国之间的权力之争无可奈何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您怎么与您的银行直言不讳地交谈呢？”如果允许我们欧洲人选择，我们也许应当鼓励中国人去收购欧洲企业，而不是让他们去收购我们的国债。这样会有利于权力的天平向我们这一方倾斜。这是非常必要的。

欧洲的债务危机令整个欧元区各国的开支剧增，在过去的3年中，仅仅国债一项就开出了高达1.8万亿欧元的账单。这份支出的责任不在中国，真正的肇事者是我们欧洲人自己。我们已经无法依照自己原来的方式生活，而必须主动地重新调整我们较高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它符合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这是一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或迟或早要降临到我们的身上，而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种发展的进程而已。这种发展就是：我们能够独自决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国家的独立能力将越来越差。这一点也适合于一种在我们自己国家范畴下所考虑和实施的民主形式。我们有权选择，我们可以脱离这种全球性分工，可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肯定将无法有效地渡过眼前的危机。或者，我们可以放弃我们民族的思维模式并且追随全球化民主。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世界性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20国峰会是正确的一步。联合国必须提高和增大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也应该加强。无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谁也无权对重大问题擅自决断。作为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密切地进行合作，这是欧洲必须学习的，而且越快越好。即使我们德国人随后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但这也不失为一条充满希望的途径。

在国际性组织机构中，也就是在那些不是屈从于世界霸主的压力，而是在那些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有联盟和妥协精神的国际组织中，比较小的国家才能同样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越早走上这条途径，越对我们有益。这有助于克服恐惧，也包括克服对中国的担心和害怕。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第一章 球床反应堆 / 1

——中国不想放手的德国核技术

第二章 一名美国打工仔 / 53

——美国的换代品与中国僵局

第三章 不和谐的四重奏 / 77

——中国急需的石油

第四章 隐秘的飞行物 / 101

——中国的新飞机

第五章 玩世不恭的用户 / 129

——为我们的贪婪所污染了的中国水资源

第六章 走遍世界的社会福利标准检查员 / 147

——我们将为“中国制造”支付何种代价

第七章 繁荣的泡沫 / 183

——中国有我们缺的钱

致 谢 / 227

译者后记 / 229

第一章 球床反应堆

——中国不想放手的德国核技术

2010年9月，德国萨尔茨堡（Salzburg）南部劳岗区（Leogang），

一家名为“小吃店”的小饭馆

在这个名为“小吃店”的小饭馆，一个角落的长凳上，坐着一群上了年纪的先生，从他们面前那些餐后盘子里的“残渣余孽”中，您也许还能感受到这道奥地利传统餐——浇汁炖鹿肉，配上酸果酱和面团——的痕迹。小店里边挺热乎。老人们都渴了。他们刚刚爬完附近一座名为韦德亨勒的大约2000米高的山头，来到这家餐馆小聚。这是一个男士爬山协会吗？是的，但却是完全另外的一种。“保持核电力，经济和环保也许能再兴！”这就是他们今天晚上酒桌上的话题。举起盛着黄澄澄的鲜啤酒的大杯子，他们频频干杯、共同祝愿。这些情绪不错的退休人员属于德语区核工业的精英。自1971年以来，他们年年都举行这种所谓的“核电力登山者”聚会。“这尚未被禁止”——邀请信上这么写着。

当时，也就是几个月前，他们对这个世界还是满意的。准确地说：重获满意，而且眼下满意。重获满意，是因为德国的黑黄联盟政府^①刚刚决定，

① 指默克尔领导下的基民盟、基社盟姐妹党与自民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基民盟、基社盟以传统的基督教徒为基本群体，把保守基督教传统道德、观念作为基本，故为“黑色”。自民党以中小企业家为基本群体，把自由经济和民主作为基本，故为“黄色”。所以，现政府有黑黄联盟之称。

延长核电站的使用时间。眼下满意，是因为这紧张得快要爆炸的地球板块还没有被日本海湾甩出去。没有人提及日本的地震和海啸，没有人对这个岛国东海岸核电站技术的老化感兴趣。相反，这些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重新放眼未来。他们谈论的是某种复兴，有的甚至还微笑着提及核电站的“再崛起”。这是德国核能精英老一代短暂而神采飞扬的时刻。他们此刻所期望的就是，他们毕生杰作的硕果能够重新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尽管他们自己作为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已经退休了。

在德国，已经没有人再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了。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在德国核能下马的初期，决定就已经做出——德国不再修建新的核电站。因此，德国核工业把他们的技术和知识转让给了中国人。这是核工业领域的新一代技术和知识，是在德国不再以工业化标准继续使用的新一代技术和知识。这种所谓的“球床反应堆技术”就属于特别安全的技术。通过这种特殊的建造方式，即便是遇到地震或者类似于海啸席卷福岛（Fukushima）那样的情况，核反应高炉内通常难免发生的一种危险——堆芯熔化——也能够免除，绝大部分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都这么说。只要使用这种技术，一旦遇到问题，核反应堆完全可以凭自身的能力冷却下来。可德国却放弃了这个技术，现在，中国在使用这种技术。中国在大量地修建风力、太阳能尤其是火力发电站的同时，计划到2030年，要建造200多座核电站，其中25座已经在建设之中^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建如此多的新核电站，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要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拥有核电站数量最多的国家。

球床反应堆技术向中国转移这件事情，有可能成为技术发展史上最富于影响力的技术转让。极其敏感的高尖端技术从西方转向东方，从一个工业国家转移到一个新兴经济实体，从一个老工业社会转移到一个新技术社会。在这次“核电力登山者”聚会前不久，中国人已经与这些德语区的核工业精英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联系。这些德国人可以对那些年轻的中国物理

① “中国核电力”，刊登在《世界核能协会》2011年7月号。